

第十一期要目(三月廿六日出版)

今後的學生運動.....陶百川

學期的國際局勢.....王家樹

國民黨與民衆運動.....王家樹

對於國民黨的希望.....王家樹

國民黨應速組織青年團.....李柏青

黨員今後的中心工作.....王龍章

獻給國民黨代表大會的意見.....高風

蔣委員長之超人的精神和才能.....魏雲萍

血路

每星期六出版

社 長 陶百川

編輯 王家樹

通訊處：漢口雲樞路麗華里五號

地址：湖北街 電話：二四二八二

價目：零售五分 預定半年一元 全年二元

本刊已呈請郵政機關登記

本 期 特 輯

再論國民黨之過去與現在和將來



今後的學生運動

陶百川

「五四」以前的學生運動，是學生讀書運動；五四到民國十七年中間的學生運動，是學生政治運動；十七年到「八一三」中間的學生運動，是學生自治運動。當然，劃分以上三個時期所根據的標準，是各個時期中比較最顯著的一個現象；我並不是說五四以後的學生絕對不讀書，十七年以後的學生絕對不參政。

今後的學生運動呢？我以為應該是學生救國運動。

我所主張的學生救國運動，包含着四個要點：一是知識運動，二是健康運動，三是自治運動，四是戰時服務或社會服務運動。它的最高的指導原則，是三民主義。它的最終的目的，是救國和建國。

請得簡單說明我的見解：

(一)無論同學們愛聽不愛聽，我在良知上必得告訴大家：學生的本分，終究仍是讀書求知。孫中山先生在竭力鼓吹學生參加國民革命的時候，不斷的大聲疾呼：「革命的基礎，是在高深的學問」，——這實在值得我們深思。假使學生可以不必讀書，那我以為他們大可離開學校，當然也不配再稱為「學生」。既在學校，既稱為學生，那就非讀書求知不可；雖然我也反對「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

(二)健康運動的主要內容，是

體育和軍訓。日本人的平均壽命是四十八歲，服務年限是二十四年；中國人的平均壽命是三十歲，服務年限是十五年。(據衛生署的估計)就以這一點而論，中國已經不是日本的敵手。救國和復興民族，一般人祇注意政治和經濟的作用，而忽略了「生物的作用」；但是假使一國青年的身體健康不幸都毀不上投考航空學校，那個國家還有什麼希望！

(三)自治生活是政治生活的一種。提倡學生自治運動的人而竟有不同意或反對學生自治運動的，這實在令人驚疑。現階段的學生政治運動，是一種政治教育，是一種自我訓練，而絕對不能像過去那樣反抗政府，奪取政權。因此，今後的學生政治運動，除了戰時和社會服務外，必須從事自治運動，而且也祇能從事自治運動。

(四)「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也當以服務為生活；所以求學時期也

應從事一部份戰時服務或社會服務。所有組織民衆，教育民衆，偵查漢奸，募集財物，慰勞將士(及其家屬)，服務傷兵，扶助老弱，鼓勵從軍，防空演習，以及宣傳戰事實況和軍事常識等，學生都應有組織有計畫的去。要說政治運動，這就是一種政治運動。

學生救國運動，應該求其真能救國，(建國包含在救國之中)，應該防止誤國害國。而欲求其真能救國，則學生運動不可不同時提倡並實行知識運動，健康運動，自治運動和服務運動。

寫到這裏，想起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在最近一次大會中關於青年運動的決議。根據那個決議，青年團今後變為青年的訓練機關，完全拋棄政黨的形式和精神；青年團今後不得代表參加第三國際；青年團今後的工作，是讀書求知，鍛鍊體魄，和勞動服務。這個破天荒的決議，是基於史太林的命令；而史太林的用意，是欲以此培植一批真正健全的幹部。

因為各地學生代表正在武漢舉行集會，我們特地貢獻以上的意見，希望同學們不要「河漢斯言」！

為培養青年作家徵文啓事(一)

本社為鼓勵青年無名作家之作文興趣，特由本社社長陶百川先生每月捐洋四元，每期舉行徵文一次，每次錄取一二篇，每篇致酬二元至十元。茲將第一次辦法揭發於後：

一、題目：「我怎樣幫助了這次神聖的戰爭？」

二、字數和截止期：兩千字左右；四月十五日截止。



戰局
鳥瞰

戰局大勢趨重津浦

楊家麟

我全線反攻曾在臨沂獲勝，津浦相持，敵配合作戰，擬由南通北窺，封邱偷渡，山西繼續混戰，東線中路緊張。

最近戰局大勢，趨重津浦。前幾天，我軍在魯東兩路方面，曾打了一次勝仗。但在鐵路正面，敵乘着我重兵均配備在界河前線，後方相當空虛的時機，由右翼迂迴突破我香城之線，並乘勢攻陷了臨縣臨城和韓莊。韓莊已靠近徐州，所以保衛徐州的戰爭，現在已到了很嚴重的階段。

現在這方面的形勢是敵我在韓莊與台兒莊間隔運河相持。過去好多次守河戰爭的經驗和國軍配備的情形看來，我們若達到阻止敵人南下的目的，不能單靠正面的迎擊堵截，還要靠着側翼的攻勢防禦。軍事當局大概有鑒於此，業於廿二日晨發動全線反攻。所以徐州的安危，要看這次反攻的結果，特別要看：(一)渡河北進的生力軍，能否在津浦線臨沂支線和運河交叉的矩形面積內，夾擊深入的敵人。(二)由右翼迂迴側擊的部隊，能否深入鄒縣縣城和臨城的中間，截斷敵人的後路。(三)由左翼京滬方面越運河向濟寧兗州挺進的部隊，能否到達兗州附近的鐵路線。(四)在臨沂方面打勝仗的我軍，能否不受韓莊失守的影響。因為臨沂在目前是一個很重要的支點，它不僅可以阻止敵軍由青島南下，並且要掩護我軍北上，側擊深入的敵人。

在這最緊張的一幕中，我們雖然有看可以樂觀的條件，例如那裏有能協助軍隊的民衆；有肯出力肯犧牲的將士（如臨沂戰役中的張自忠團長和長和縣縣戰役中守土殉職的師旅團長）。但我們不

容絲毫大意，因為這一戰關鍵太大，牽涉太廣了。

敵徐州很遠的南通，最近突然到了好幾萬敵兵。他們是不曾到這個角落裏來休息的，所以我們推斷他們或許會由臨城阜寧直趨東海，或由阜寧側擊蘇省府所在地的淮陰以夾擊徐州。同時魯東和道清線的敵軍都向東移，開封對面的封邱到了一萬多敵人，二十二日封邱的荊隆官渡口有五百多敵兵，陣地掩護，企圖渡河。這兩個新的動態，都與津浦戰局有關，所以我認為徐州的安危，最後還要看東線和黃河線能否固守。

山西仍繼續混戰着。十八日敵用一師團以上的兵力，向晉西南的鄉寧進攻。我軍在晉北方面傳已收復保德離石；在晉東方面傳已收復黎城陽城，並已乘勝向豫北挺進。這方面的司令長官最近有很堅決的兩句話：「寧在山西犧牲，不在他處流亡」。

津浦南段，自我軍在江蘇反攻得手，敵抽調大部兩渡增援後，我皖中遊擊隊遂愈形活躍。十八日我某部突出奇兵包圍定遠，克復考城。二十日某部又收復沙河車站及張八嶺車站。

在東線上，敵正企圖打通長興至宣城段的公路交通，俾逆斷太湖沿岸我軍的連絡，並便利杭蕪間的軍事運輸。十六日敵用重砲攻陷孫家埠，十九日由宣城東犯洪林橋，二十日由長興武康分三路進攻孝豐安吉；安吉的北面洪林橋的東面是廣德，所以敵人想爭奪這一個據點，是很明顯的。

如何培植黨的新生

命

劉修如

國民黨復興之路，應從那裏着手？最近黨內黨外的人提出很多意見。但我以為要想做一事可使黨的精神煥然一新，同時為黨與國家民族百年之計着想的，祇有從青年訓練做起。這是從根做起的辦法，德意志的國社黨，意大利的法西斯黨，蘇俄的共產黨，他們這種蓬勃勢力之興起，都是得力於此。具體辦法，我主張以全國所有自高小至高中的男女學生及自十二歲至十七歲的農工商男女少年，一律編入中國童子軍。童子軍的訓練宗旨和辦法，仍然依照現在的中國童子軍做去，所欲改進者：

- 第一。加緊精神訓練，技術訓練與生活訓練。
 - 第二。注重童子軍平日生活與操行之糾正；凡童子軍之一切生活，不得違反新生活規律。
 - 第三。加多平日露營、旅行、運動會之演習，藉以增進其奮鬥精神與集團生活。
 - 第四。儘量推廣都市裏的工商界和農村裏的農工少年童子軍之組織，務求其普遍化、社會化。
 - 第五。凡適齡少年之童子軍，平日一律以童子軍之制服為常服。
 - 第六。籌辦大規模之童子軍師資訓練學校，造就大量師資，分發全國各地擔任童子軍教練員。
 - 第七。中國童子軍應直屬於國民政府教育部，由教育部負責主持，因為我們要以牠當做國家公民的基礎訓練。
- 其次，國民黨應組三民主義青年團，由中央黨部負責主持，就大學生及十八歲至三十歲之農、工、商、自由職業者，公務人員中，選拔其優秀分子吸收為團員，其辦法要點：



眼前的國際局勢

王龍章

眼前的國際舞台：在英國是妥意近德，藉以維護其全世界的利益；在法國是一面追隨倫敦，一面又拉着莫斯科；在美國是站在國際主義與孤立主義之間，而以英國平行行動作爲條件；在俄國是先要列強間發生火併，然後始有行動，在德國是爲了力爭地中海霸權，乘機要挾張伯倫；——在這種俄列強均不願戰爭，遂急速向外發展；——在這種形勢之下，歐洲首先被犧牲的是奧地利，最感恐慌的是捷克，觸着霉頭的是立陶宛，而西班牙問題亦因此而嚴重。至於中日糾紛，也因歐局的不安，而增加日寇的氣燄。

中歐的火藥庫，雖未爆發，而其危機已由奧地利而移至捷克。捷克在地理上，在少數民族問題上，終是褐色總理的對象。德國雖已宣佈不擬乘奧國事變的勝利，而對捷克有什麼行動，但是英國不願以武力保障捷克獨立的態度很顯明，目下捷克所能賴爲外援的力量，只有依靠一九二五年捷法互助協定和一九三五年捷俄互助協定了。捷德談話將開始，我們且靜看法俄所能給與捷克的幫助究有幾何？

立陶宛和波蘭的糾紛，將近二十年。日前又突以邊境的小事件，鬧得小題大做，歐洲的聲浪，顯然已由中歐傳染到東歐。波蘭是反俄親德的國家，因爲德國在中歐勢力的膨脹和英法態度的猶豫，預料波蘭也不會出面干涉，所以便乘火打劫。立陶宛眼看波蘭得不到俄國的幫助，只有不顧人民的責難，忍

痛接受波蘭的五項最後通牒。波蘭這個行動，不但是在響應德意，而且在擴張波羅的海的勢力。試看波蘭最近又主張與芬蘭、羅馬尼亞、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立陶宛等國組成中立國集團，這又是一隔離德俄兩國計劃」中的新花樣。

鬧得快要兩年的西班牙問題，現在又趨於嚴重化，這也與德意態度有聯帶性質的。近來國民軍爲什麼能大勝，政府軍又爲什麼眼看將有不能支持的趨勢呢？顯明的答案，乃是意德增加了大量的援軍。在英意正當談判時，所謂不干涉西班牙內亂的協定，竟這樣不值一文錢。然而這道理也簡單：德國是在報答意大利的對奧諒解，意國是在逼着英國減低地中海的價目。

英法美俄幾個大國的態度怎樣呢？一言以蔽之，「避戰」而已。張伯倫因「避戰」而求妥協，求安定，勃魯姆內閣因「避戰」而替捷克問題西班牙問題在發急；赫爾的宣言，因「避戰」而大談其正義與和平；李維諾夫的說帖，也是因「避戰」而刺激英法的態度，害着軍相思的「集體安全」。所以就中國論，我們祇有以抗戰事實，抵抗日本，轉變國際的環境，切不可夢想所謂「和平陣綫」對「侵略陣綫」的制裁。

日本議會最近通過總動員法案，此對我國和蘇聯的影響，自必甚大。本期以限於篇幅不能多寫，下期當出記者寫一專文，以供參考。

第一。照中央，省，縣，區，組，各級，遞次予以嚴密之組織，除中央外，省，縣，區，各級之書記及幹事，均採用選舉制；小組之教練員則由上級聘派。

第二。青年團之各小組單位，每星期就業餘時間至少應有一次至二次之訓練與討論，訓練包括國防訓練、政治訓練、與人格訓練；討論包括政治活動、社會服務與個人批評。

第三。青年團團員，仿照德意志之楊杉黨，規定一種適宜之制服，爲每一團員之常服，團員對社會公開，不需秘密。

第四。青年團團員，在生活操守方面，應絕對遵守新生活運動；在政治運動方面，應絕對接受黨的命令，從事於推行三民主義的一切政治活動；在社會服務方面，至少隨時隨地負規勸督導他人，推行新生活運動之責，做一個社會上的義務憲兵。

第五。青年團要做到全國統一，只有組織，沒有任何派別系統及私人關係，團員對黨應遵守紀律，服從指揮，履行義務，同時黨對團員應按其能力與勞績，負保障與提拔之責。

第六。仿照英國「青年寄宿舍協會」及其基督教青年會方式，漸次的，在全國各省各縣各區，籌款建立青年團俱樂部，作爲演講，開會，旅行寄宿，休息交誼，體育活動，人格陶冶，集團生活之用。

第七。青年團與童子軍不同之點：童子軍是在適齡少年之中普遍訓練的，青年團是在適齡青年之中選擇的；童子軍是國家的，所以由國民政府教育部主管，青年團是黨的，所以由國民黨中央黨部主管。將來的目標，要做到青年團的團員，必需是童子軍年滿出身，而童子軍年滿出身的，不一定都能加入青年團爲團員。



國民黨與黨派問題

陳銘樞

百川兄：

承示爲貴刊寫關於黨的文字，茲錄奉「抗戰中之黨派問題」一篇。此文聞曾登於「戰鬥」第十七期，不知何故，各書市都買不到，弟認爲可惜，茲復錄之以應徵，想不爲嫌罷？又以拙作字字都從中情流出，使吾黨同志讀之，未嘗無反省激勵之助；即黨外之誠意的讀者，亦可引發其警惕和責任之觀念。所以認爲有廣佈之價值。吾兄得無晒其不自諒耶？此頌
勳安！

弟陳銘樞。十二日。

我在寫本文之前，要將我的政治態度和立場申明一下：我和若干位朋友每對政治有所談論，必言不離宗的提出「鞏固統一抗戰到底」八字，我個人曾應掃蕩私之囑將這個題目寫過一篇文章，這是我們主張的唯一原則；本着這個原則，無論在內在外對公對私都打開窗子說同一本旨的亮話，司馬君實說：「無事不可對人言」。我想這句話真是中國這個時代的實話，人人都當效法。這是我們精神上的規律，至於我的立場，如大家知道的，我是一個老國民黨員，我是三民主義的信徒，但是也如大家知道的，我曾一度離開國民黨和多年的長官蔣委員長，我和許多朋友曾經組織了一個團體，名爲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我原意坦白的說，這一段歷史，無論在個人、在國家都是一件不幸的事，但我也必須坦白的承認，我沒有一天拋棄三民主義的信仰，至少我個人主觀上是這樣自信。但民族革命同盟之惟一目的，就是促進全國力量之集中對日抗戰。所以在抗戰發動以後，我們認爲我們的民族革命同盟抗日的希望既已實現，則今後的努力就是參加和擁護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而這是全國同胞一個總目的。所以我們自己的組織也就可以解散，所有舊日同志各個爲抗日而努力，而我當然也就回

復我國民黨的地位，所以我現在是站在國民黨一個黨員的立場說話。

九一八以來，全國都抱定抗日救國的決心，這決心，只有緩急之分，決無原則之異。「不分黨派」；「擁護中央發動抗日戰爭」等等口號，數年來除了漢奸們，凡血氣之人無不歡欣起舞齊集於政府抗日大纛之下，各黨各派聚首一堂了，國民黨的政府，黨的最高領袖——全國唯一的領袖領導起來抗日，發揚三民主義的光榮，實行總理的政策——遺教，在本黨以外的一切黨派也衆口一辭這樣說，連血戰十年極端不相容的共產黨，也宣言擁護三民主義了。從抗戰的事實所表現，國民黨已經居於唯一領導抗日的地位。我們回想首都南京未陷落以前，許多朝野人士在文字上和談吐中所流露一種極自然的同感之一句話，即是：「民國開元以來所未見之大統一團結的好現象」，在那個時候，都以爲在共同奉命抗日的民族革命最高原則之下，黨派的政見不會發生磨擦，且誰也不願看見這種磨擦，那末，黨派論爭的問題，不是不應該有的嗎？在南京時無有，反而退守到武漢才出不應該有而竟有，這是

甚麼緣故？假使我們軍事不失敗，東戰場至今仍保持在淞滬線，南京不陷落，太原不失守，河北不放棄，乃至一帆風順，使倭虜氣竭力蹙蹙而遁逃，則這種磨擦當不易發生，亦不成甚麼問題。可是軍事失敗，疆土短縮，一般看不到抗戰最後勝利之基本力量，和必向著的光明前途，使恍於戰爭初段或過程中所不能免的失敗而動搖，而傍徨，而恐懼，直至不知不覺間忘却了共守的抗日唯一最高原則，轉過頭來，爲自己的集團打算了。既萌了這個私的念頭，便不能不打他人的主意了。黨派論爭的問題是不是從這種心理而起的呢？倘我們的覺察是不錯，我今設個比喻以證明這種心理是應該，抑是謬誤。比如有大股強盜攻犯我的鄉里，要強佔領去子弟，不單聯結守望相助的隣里，不事先充實守禦，怨望之起，一面各作逃生之計；而爲家鄉里長們徒惶惶然恨子弟之不齊力，疑子弟之生異心，而思披肝瀝膽，激勵鼓舞，動以公義，示以死中求生之道，則怎能免覆家亡族的劫運！要知外患愈深，內部團結愈堅固；敵人愈打來得兇猛，擁護首領和愛惜手足，愈熱烈周到。現在不是外患愈深，敵人愈來愈兇猛的時候麼？公忠愛國的同志，那有工夫來論爭黨派的問題！

然而不應有的問題已經有了，問題既已發生，徒然太息是無用的，袖手旁觀是更不應該的，我們應當解答問題。古人有句歷史極沉痛的話「敵人業已渡河而朝論尚紛紜未定」。目前陷到這種緊迫的形勢，豈有時問允許紛紛之論？然因爲有紛紛之論，所以自然會引起本黨——國民黨的唯一性問題來了，何以謂爲唯一性？申言之，近年來國民黨正準備結束訓政時期，渡入憲政時期；在這個將渡未渡

之問，忽臨了對外決國族生死存亡之長期戰爭，應如何統一一切思想意志政見，集中一切人力財力物力智力於中央，且掌握於最高領袖之下，俾靈活運用政權與指揮軍事，方能勝敵圖功，——要能做到這些，再無有善於一黨專政了。即不特不宜渡入憲政，且宜回復完全訓政時期，甚至到一種新軍政時期，所謂唯一性是不是這個意義？站在那一個黨的人們都不免要自己的覺得權勢，愈大愈好，以至祇有我自己一個黨，我是國民黨人，當然主觀上亦是這樣想。即就客觀而論，以目前的形勢之險惡如此，果能全國祇有一個黨，不是最合了前說的勝敵圖功的條件麼？更何至於有紛紛之論——黨派的爭論？但是，儘管主觀上是這樣想，客觀上亦是這樣於目前形勢有利，而各黨派間歷史已成的事實——的亦是客觀的事實，是否無須乎檢討？

我想排在目前的目的，毋庸解說，許多人都看得到罷？我姑不作檢討，而不能不提出一種歷史的教訓和未來推移的警惕。這是甚麼？即：假使我們祇要完成唯一的本黨而不計其他的公開存在，事實上牠們仍秘密存在，我們將何術以防止牠，這不是已往多少年經過無限的血的教訓嗎？即幸而在這對於抗戰的時期，愛國的團體都應該捨其所私而貢獻於公，可以勉就我們之範，而不知秘密存在之害，實十倍於公開存在。然則未來推移之可警惕，不又極顯然的嗎？這種可悲可慮的事件，不容輕易忽略的，我們須盡忠慮慮為國族謀，為本黨謀，慎勿蹈已往的覆轍和貽來日的大憂！

上文說過，現在國民黨已居於唯一領導抗日的地位，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既形成了唯一的地位，本自不衰，何以許多人還提出「國民黨復興的問題」呢？既云復興，當然感覺許多空乏，許多缺點；當然要另有積極的方針，作彌補挽救和健全的建樹；這才是本黨本身的真正問題。只要我們能從本身

切實檢討不自寬假地發憤努力，積極整刷發揚光大自己，不特可以長久鞏固唯一的領導權，甚至於將達到完成唯一的黨的願望，若不圖健全充實本身，積極領導全國民眾，而把所有空乏，缺點，甚至錯誤都要掩飾下去，反過來對黨外只做防拒的工夫，這是自暴自欺的心理！這是自壞長城的勾當，我想我們決不會有此，萬一不幸而有此，則不特不能阻止他黨之發展，連自黨的前途亦將自割了。因為從古到今未有單黨消極的防範別人而自己無積極的作法所能長在啊！上兩個一正一反的意義，乃是事理上所必有的推論，凡屬一個黨員不可無這樣反省警惕心理，更不可無這樣的奮發為雄的精神；不然，我們所以舉出的「復興問題」有何意義呢？所以我們必須一面反省警惕，一面奮發為雄，復興大業，端繫於此；此亦是最切實最根本的問題。我們正因有對國家民族負責的大願，便應責己更嚴。

上面對於國民黨唯一性的問題和最根本的復興問題已說了許多話。至於對於本黨以外黨派的存在問題，最善處的方法，我認爲應：

(一) 國民黨自身積極起來，提示鮮明的戰時綱領和表現堅決的領導行動；一面統一黨的意志，消滅黨內派別鬥爭，和改善黨的組織，以提高黨的真實威權。

(二) 國民黨以外的黨派，如能支持國民黨政治主張而自願解散組織者，國民黨固應歡迎；即不願解散組織而誠意支持國民黨抗戰主張擁護政府抗戰政策的，亦可任其存在。只有法律問題，沒有黨派問題。

(三) 爲鞏固團結加強抗戰力量起見，政府雖不必一定要不開放政權，但應集中全國各方面人才於政府機關。或者也可說，只問人才，不問黨派。我寫下這三點意見，尤其寫到第二點時，不禁又引起我前舉的「鞏固統一抗戰到底」八個字的唯

一原則和精神上的規律話頭來了。我所謂「鞏固統一」者，不僅爲目前所需要，乃是爲長期所需要；不僅爲抗戰時所需要，乃是爲抗戰後建設真正獨立的民族國家所需要；並且在抗戰經過愈危，國土愈變，形勢愈險的時候，越發需要，——加緊的百千萬倍的需要。因爲不然的話，我們試問目一想：倘愈在危險中而不能愈團結，愈不能緊緊維繫住成爲整個陣線跟着統一的唯一的領導之下去應付益肆兇毒殘忍狡滑無倫愈入愈深的敵人，則其禍害之嚴重，比諸任何不滿意和失望之事，實超過百千萬倍！那末，我今對於各黨各派連一切的有實力者在內，舉出兩條規律，作爲衡量的尺度：

(一) 不僅不因形勢愈險惡而動搖、傍徨、恐懼、而失望、懷怨、而別萌私見；且應形勢愈險惡而降心相從，上下相諒，內外相通，而加鞏固統一戰線，即更加形成一心一德擁護政府和最高領袖。

(二) 在形勢愈險惡當中，如有別爲自己團體打算逞其私圖者，即是要破壞統一分裂抗日戰線和危害國家；我相信凡屬一個光明立場的政治黨派，都會想到這種責任——罪名的。倘不顧到這種責任而打私的主意者，必將自絕於國，自絕於民眾，自絕於自己黨派的生命。

上舉這兩個尺度，我望本黨拿來衡量自己，也望其他一切黨派的人拿來衡量自己，並望各方面負責人士以及全國同胞都拿來衡量自己。

至於將來的黨治問題，我想是更容易解決，任何人沒有異議的。到了本黨完成了國民革命的使命，到了憲政時期，自然還政於民。但這自然不是說本黨將棄其對國家的責任。只要本黨能繼續領導全國得到全國民眾的擁護，本黨當然還是在領導地位。我敢說一句：只要本黨能不離民眾，民眾一定擁護本黨。只要本黨能自強不息，本黨總是國家民族的中心！



國民黨與民衆運動

王家樹

抗戰以來，民衆運動又回復到北伐時代的蓬勃狀態，新興人民團體，多至不可勝數，輿論界對於民衆運動，討論得十分熱烈，政府也下了決心來動員民衆，這原是好現象。然而一究實際，却使人在興奮之中不能不運感到有些缺憾。

就以武漢而論，民衆運動已相當活躍，可是究竟動員了多少民衆？對於抗戰有幾許裨益？恐怕誰都不會有滿意的答覆。其他各地不必說了，所見到的只是「紛亂」與「空洞」！然而比從前也進步了。這些缺憾的構成，頗有些人歸咎於國民黨身上，其實，這種說法是似是而非的。誠如吳開先先生最近在本刊「現階段的民衆運動」一文裏所說：「世界上任何一國（中國在內），動員工作都是政府的工作。以中國教育不普及和其他關於動員準備工作的欠缺，當然不能像其他現代國家戰時總動員模範地動員起來」。相反的，國民黨認爲國民革命之完成，全賴多數民衆與國民黨深相結合之後，始有可成；所以國民黨對於民衆運動，始終採取積極扶植的態度。

不過，目的是固定不移的，而政策却因時間空間不同而隨時修正，民衆運動當然也不能例外。北伐以前，國民黨爲摧毀反動政權及外來侵略力量，故對於民衆運動的政策，偏重於鬥爭的破壞的方式。北伐完成後，國內已告統一，爲鞏固這一國民所共有的革命政策，並按步建設，以增進人民的幸福，民衆運動當然要改變爲和平的建設的形式。但是，到了現在，時代顯已不同，僅僅根據這個原則，

不夠動員民衆，不夠應付抗戰的需要，這也是事實。所以國民黨對於民衆運動的組織，訓練，幹部，調整機構，修改立法等問題，都有重加檢討的必要。特分述於下：

一、組織問題

記得抗戰初期，有些人提出民主「自由」與「開放民衆運動」的口號，這種主張我們自始是贊同的；實際上政府和國民黨部，只要不違法，對於民衆運動，也無限制，抗戰以後，更爲放任，不過無條件的「開放」，結果會陷於「盲動」「亂動」或反有害於抗戰。現在各地救亡或戰地服務團體，很多是不經黨政機關立案，因此人數少的，三五人居然也成一單位，既無經費，又無工作，大都停留在都市裏，做些虛應故事的工作。此外，同一區域同一性質團體之匯成雙包乃至三包的，已數見不鮮，形成無數疊林架屋的畸形組織；武漢全國性青年團體同時成立了二個，即其一例。至於全國性團體，其組成份子是否包括全國，其組織原則是否合法，更多疑問。這些現象，充分說明了民衆團體必須有合理管制，任何團體的成立，都應該經過合法的程序，尤其在戰時，一切需要統一於政府指導之下，才能集中力量，發揮力量。否則，民衆自民衆，政府自政府，各自爲政，漫無管制，那裏談得上動員呢？也許有人認爲管制是違反「民主」「自由」的原則，其實這是適應抗戰需要的必要措置，真能了解民主自由真諦和忠於抗戰的人，一定不會反對的。

關於民衆組織的分類，不外乎下列二種：一、是以實現共同目的而組成的——如文化，宗教等社會團體；二、是以特殊利害相同關係而結合的，——如工會，農會，商會等職業團體。可是現在許多民運法規，關於民衆組織的原則是否適合當前環境，很成問題。如工人團體，照工會法不許有省和全國性的組織，但現在各地工人已發動地方和全國性的總組織了，甘陝寧三省且有邊區總工會的成立，其他各種團體也有類似情形，究竟民衆團體的地區總組織應否存在？那幾種性質的團體可以有全國性的組織？這都待於從長計議的。

至於職業團體的組織份子，也有重行考慮之處，如商店職工，按照同業公會法祇可加入同業公會，不能單獨組織職工會；現在的農會，是地主與僱農混合參加的，以利益不一致的份子混合在一起，是根本違反民衆組織原則的，結果不出下列三點：一、被一方面所操縱，壓制；二、雙方利害衝突，形成內部鬥爭；三、彼此消極，陷整個團體於無形停頓。雖然中國現時不需要階級鬥爭，而是保障民族生存和促進社會全體的利害，而社會各階層間利害不一致，確是事實，所以應該用其他方法來調和社會利益，勉強要利害不一致的民衆組織在一起，是不起作用的。因此關於民衆運動的組織原則，要立即統一的規定和合乎需要的修正。

二、訓練問題

民衆運動不僅需要民衆組織，而且需要民衆訓練，民衆活動；這三者之間有着不可分離的連繫作用。只有組織而沒有訓練與活動，這組織無異是個軀殼，不生力量；沒有組織，訓練無由實施，活動只是亂動；僅有訓練，而羣衆不參加活動，這訓練一定死滯而無用。我們要明白，民衆組織是骨幹，民衆訓練是血液，沒有血液，人體就失去生活力，

民衆運動沒有訓練，便無所謂民衆運動了。

過去民衆運動之所以不能盡如人意，全是忽略了訓練工作和訓練方式之錯誤。本來中國人民在數千年專制政體壓制下驟得解放，毫無政治經驗，所以訓練時期規定要訓練人民，養成人民政治能力，可惜我們地方自治沒有辦得好，四權訓練根本尚未開始，而民衆運動本身也大都切實注意訓練，有的也只是幾個團體職員的活動，而不是多數羣衆的行動。至於訓練方式大都是枯燥的命令方式，與羣衆生活很少有關，這當然不會引起民衆的興趣與熱情。今後欲求民衆運動積極開展，必須重視改善和加緊訓練工作。

訓練民衆有二種方式：一種是鬥爭的，——破壞的；一種是和平的——建設的。從前中國在對內革命時代，民衆運動的任務，是要摧毀封建勢力，建立革命政權，現在對外抗戰時期，抗戰高於一切，民衆運動的任務是爭取民族生存自由和幸福。所以訓練人民也應該分二種方式，對外是鬥爭的，破壞的，提高人民抗戰情緒，集中力量，參加抗戰；對內是和平的，建設的，以漸進合理的方式，來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利害之協調。其實方法可分爲二種：第一、在民衆團體方面，應強制規定舉辦各種戰時服務、教育、娛樂、經濟互助等事業，經常舉行工作檢討，政治問題討論等集會，主管機關應隨時督促各團體切實實行。第二、在行政組織上，利用保甲制度以實施訓練人民，最爲便利，如鼓勵服兵役、工役、立即召開村鄉鎮民大會，試行保甲鄉鎮區長等自治人員的民選及罷免。這樣，一面可以鍛鍊人民的政治能力，一面又有刷新政治之效。總之，唯有加緊訓練民衆，才能完成民運的任務。

三·幹部問題

「幹部決定一切」，這句話是千準萬確的。幹部是團體的心臟，是羣衆的保母，是機關的馬達；民衆運動的能否推動，全視幹部是否得人而定。

我們不容隱諱，現時有一部份民運幹部，犯了下列通病：

- 一、自私自利觀念；
- 二、官僚氣味太重；
- 三、輕視民衆利益。

這些民運幹部，實是民衆運動的最大障礙。在這裏，我們要問從事民運工作者提出一個最誠懇的要求：現在已不是過去黨派爭奪政權的時候，國家需要我們切切實實領導人民去爭取生存，在這偉大的洪流中淘汰，爲了國家和自己，都不容許再這樣做了。

所以造就克苦耐勞的新幹部，確是當前民衆運動的急務。現在各省都在訓練青年學生，預備去做民運幹部，但這種計劃，事實上還未盡善，因爲學生理想太高，慣於都市生活，一旦到鄉僻壤的眞正民間去，往往會消氣，不能堅定持久。最妥善的辦法，應當從民衆中去吸收幹部，培養幹部，因爲只有民衆自己最能了解民衆，召喚民衆，取得民衆的親近與信仰。

同時希望國民黨許多有學識，有經驗的同志們，趕快回到民衆隊伍來！因爲國民黨負有救國建國的最大責任，黨內的確有着不少優秀的人才，在過去革命歷史上有着光榮的成就。現在國家急需民衆運動，國民黨員自然應得負起領導人民的責任來。有了健全幹部，才有健全事業，這是我們應該記住的。

四·調整機構問題

指導民衆運動原是黨的職權，但在戰時，一切都應集中於軍事指揮之下，所以民衆運動的指導權，國民黨中央已交給軍事委員會行使了。不過，目前各地指導民衆運動的機構似乎太複雜，黨部、政府、軍事機關以外，各地還有動員委員會，戰區內有黨政委員會等組織，而彼此間的職權，並沒有明確規定，致使民衆有無所適從之感。機構複雜，責任不專，往往會形成爭奪領導或大家推諉的現象。調整指導民運工作的機構，確已不容再緩了。調整的原則，我以為：（一）在一個區域內應確定一個機關賦予指導民運的全權；（二）民衆運動的許可，指導和監督，應集中於這一個機關來辦理。

至於國民黨在此時候站在怎樣的地位呢？當然國民黨不但不應放棄，並且要積極領導民衆，不過領導方式須得改變。各地方黨部對民衆團體不必發生隸屬關係，而支配黨員以民衆地位來發動民衆，領導民衆，黨應用力量幫助黨員取得民衆的信仰；黨的意志，不必用命令傳達到民衆團體，而應該以透過黨團作用的方式，來執行黨的政策。

五·修改立法問題

以上幾個問題，都需要用立法手段來促其實現，我們希望立法機關立刻把現行民衆運動法規加以修改，並制定戰時民運法規，來加強民衆運動，扶植民衆運動。同時，我們更希望這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關於今後民衆運動決定一個具體的政策。

本文目的全在於檢討過去，認識現在，以求今後民衆運動的改進，假使因此而引起黨內外人士對此作更進一步的注意與商討，那更是筆者所十分願望的。



對於國民黨的希望

錢俊瑞

最近百川先生來函，囑我寫一段「我想對國民黨說的話」之類的文章。我不是國民黨員，所以只能以普通國民的資格，來向國民黨簡要的提出幾點希望。但我並不想以第三者的資格來批評國民黨，而願意本着熱烈的同胞愛和自我批判的態度，來希望國民黨。這理由很簡單：第一，因為國民黨在今天當權的領導抗戰的黨，國民黨的好壞，不僅關係到國民黨本身，而且關係到整個民族的存亡。第二，要使國民黨能夠更加有力地領導全國民眾，更加親密地聯合全國各方面，來從事抗戰，非使國民黨本身更加健全不可。

站在這樣的立場上，我對今天的國民黨提出下面幾點希望：

第一，也可以說是最基本的，我希望國民黨能夠成爲真正以三民主義爲基本政綱的政黨。不容諱言的，民國十四年國民黨那種熱烈倡導和宣揚三民主義的精神，在今天已經沒有了，國民黨員到底有多少真正懂得三民主義，真正想奉行三民主義，那實在是個問題。在這一方面，我希望國民黨能夠用最大的努力，在黨內和黨外，實施三民主義的教育與宣傳，首先要廣大地印發三民主義和總理遺教一類的書籍，出版富有教育性的黨報，舉辦健全的黨務學校，來完成這樣的任務。

第二，我希望國民黨能在最短期內完成一個革命政黨的組織。今日的國民黨是領導和主持民族革命的黨，牠的組織應該具備一個革命黨所應具備的一切條件。首先在組織上應該有健全的領導機構

，有黨的生活和黨的工作非常充實的小組和黨團之類的組織。區分部，區黨部和縣黨部，在今天可以說已經沒有黨的經常工作了。國民黨的這種基礎組織，非立刻把她健全和結實起來，國民黨便不能成爲健全的領導民族革命的政黨。

第三，我希望國民黨今後要用主義和工作來領導國民，不要只用「治權」來強制國民。一個政黨的生命，完全建築在羣衆的信仰上。可是信仰的造成，乃是一種在實際工作中說服和領導的過程，決不是用教條和法令來強制人家的過程。國民黨同志過去在主義的宣傳上，在工作的領導上，實在做得太不夠了，要使國民黨重新做一個擁有無限羣衆的黨，國民黨同志在這方面的努力是不能忽略的。

第四，我希望國民黨今後在組織和一般工作上的努力，要集中在使黨內無派，而不要集中在使黨外無黨。大家知道在中國現有的社會政治條件之下，要使現存的黨派取消，是完全不可能的。（請參看拙著「黨派的合作與合併」，大眾生路週刊一卷二期）相反的國民黨應該在這時領導着各黨各派的合作運動，來摧毀敵人分化中國和以華制華的陰謀。可是我們對於國民黨本身却極端希望內部不要再存在什麼派別，因為黨內一有派別，就免不了無原則的爭論與糾紛。這種現象不僅使國民黨的力量爲之削弱，對整個民族也是重大的損失。在這一方面，我個人贊成冷傳先生在中山學社機關刊物上所提出的辦法建立一個國民黨的青年組織。如果國民黨能夠有這樣一個統一的青年組織，那末不但國民黨

內各部份的青年力量可以完全統一和集中起來，而且可以以此爲中心，團集全園愛國青年的力量，來充實我們的抗戰陣線。

第五，我希望國民黨在這次臨時代表大會，能完成徹底的改組。這需要學習中山先生在第一次代表大會改組國民黨時的大智和大勇。我們且看中山先生曾以怎樣堅毅的精神來重振國民黨。他說：「何以本黨在南京之時，便那樣興盛，此刻在廣東反不如前呢？原因就在本黨份子之此刻過於複雜，黨內的人格太不齊，令人家看不起，所以人都不願意加入，幫助本黨來奮鬥。譬如許多黨員總是想做大官。……照本總理看來，最要緊的事，是應該乘此機會，把那些不良份子設法去淘汰。……大家從此便可以振作精神，一致爲主義去奮鬥。」又說：「此次改組，就是從今天起重新做起。古人有言：『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由今日起合全國而爲一，羣策羣力，努力而行，到將來成功，必定更大。此即爲今後之第一大希望。」（見中山全書第三冊，七九，八，及一〇八頁）。我們希望國民黨在蔣委員長堅毅領導之下，能夠這樣自我批判，「重新做起」。

第六，也是對國民黨本身要說的最後一點，我希望國民黨的同志決不要以爲國民黨外的人都是反對國民黨的「反動份子」。應該老實不客氣地指出國民黨外的同胞，對於國民黨的愛護，有些倒反比國民黨內的同志還要周到；尤其是從抗戰以來，全國國民對於國民黨可以說已經表現了空前的擁護與幫助。這種現象決不是偶然產生，即是由整個國際和國內局勢決定的。我們希望國民黨同志要珍貴這種歷史的恩物，和全國同胞共同努力，挽救民族的垂危，重整國民黨的威聲。（三，一二於參加中山先生逝世十三週紀念盛大遊行後）



國民黨應速組織青年團

李柏青

一、為什麼要組織青年團

偉大的時代到了。誰能負起這個大時代的使命呢？從中國的歷史發展上說，國民黨實在是現階段的天之驕子，惟有國民黨才能負起這個使命。這不是一種理論，而且是鐵一般的事實。

然而，國民黨在現階段，不能盡量發揮其革命性，這也是一種不可掩飾的缺陷。我們怎樣才能補救這種缺陷呢？我認為須積極的充實黨的生命力。所以國民黨有從速組織青年團的必要。我的理由：

第一、從生物學上說：新陳代謝，是天然公例。國民黨假設不積極的組織青年團，吸收廣大的革命青年，國民黨的本身，就不能夠適應新陳代謝的公例，於是就會失去靈魂，變成軀殼。

第二、從生理學上說：青年因為青春腺繁盛的緣故，所以富於進取、向上、冒險、勇敢等特質，這都是革命黨員的必要元素。國民黨必須要有這種新的元素，形成強固的集團，才能充分發揮革命性來。

第三、從現勢上說：中國抗戰已一天天地擴大，失學失業的青年，也一天天的增多，國民黨假使不把這些青年組織起來，不僅是抗戰的損失，而且是三民主義革命的無形阻力。

至於為什麼要把青年黨員另外形成一個組織呢？因為要使黨的工作敏利而有效力，必須把黨的工作調度得非常適宜。一般青年與非青年，在認識上，情緒上，行動上……都有極顯著的差別，要把青年與非青年，強納於一個組織裏，一定要發生許多矛盾；所以為使革命工作的順利推進，必須要在國民黨中，另有一個青年的組織。而且一定要有這

樣一個新的組織，青年方可源源而來。

世界各國的政黨，差不多都有青年團的組織，作一種單獨的活動。例如：德國國社黨有希特拉青年團，意大利有法西斯黨的青年團，蘇聯有布爾薩維克的青年團，歐美日本各國的政黨，也大都都有青年團的組織。因為這是客觀形勢所必需的。

二、怎樣建立青年團

怎樣建立國民黨的青年團呢？我的意見：第一步驟，由國民黨中央指派青年運動特派員七人，（注意都應該是青年才行！）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最高幹部。並指定一人為總書記。在總書記下，設總務部，組織部，宣傳部，訓練部，調查部，服務部六部。

第二個步驟，由國民黨中央命令各級黨部，凡年齡在二十歲以下的黨員，須一律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以為團中的基本團員。並由青年團中央最高幹部的量分配工作。中央並應建立省市縣區各級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部。

第三個步驟，由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最高幹部，公開登記失學失業青年，集中訓練，施以嚴格的政治軍事社會教育，並儘量介紹其入團為團員。

第四個步驟，開始建立最下層的細胞組織——小組。小組人數至多不得超過十人，每組設組長一人，由小組組員推選，呈由上級團部委派之。

第五個步驟，要建立各級細胞組織。要推選小組代表，成立小組代表會議；要產生縣代表，成立縣代表會議；要產生市代表，成立省市代表會議；最後，要產生全國代表大會，正式產生最高幹部，並呈由國民黨中央加委。

三、青年團的基本任務和工作

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基本任務在那裏？我認為：

（一）爭取抗戰勝利——目前中國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只有誓死抗戰到底，才能爭取最後勝利，這已成了必然的形勢。三民主義青年團，是中國革命的中堅，抗戰是中國革命的一種過程，所以青年團第一當然是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

（二）努力建國運動——中國革命的目的，在求得中國的獨立自由平等，建設一現代化國家。一面抗戰，一面建國，這是目前國民黨的主要任務。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當然是努力於建國運動了。

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主要工作是什麼？我認為：（一）努力修養——青年時期，倘若沒有充分的修養，就絕對不能負起重大的責任，創造偉大的事業。所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主要工作，第一就是在教育自己，鍛鍊自己，養成一般德智體力高於一般人的青年羣，以為中國革命的最強固的基礎。

（二）服務社會——人類是政治的動物，政治是什麼？政治就是人類的社會制度。革命的目的，在改造人類的社會制度。所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主要工作，第二是在服務社會，為社會大眾謀幸福。在抗戰期間，並應從事戰時服務，以盡國民天責。

四、我的展望

自發動抗戰以來，一般青年雖然熱血沸騰，一個個都爭先恐後的起來努力救國工作。但在中國特殊的環境下，一般青年的救國熱誠，往往不能配合抗戰的發展，都發生了異常的苦悶，最近陶百川先生在血路週刊上提到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話，聽說就有好幾位青年寫信給陶先生，表示贊成和期待。我們的中央當局，如果能接受我們這個意見，從速建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不但黨能虎虎有生氣，就是對於抗戰和革命也會有巨大的幫助。



獻給國民黨代表大會的意見

高 風

國民黨將召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既名「臨時」，自然有非常意義。這不但是國民黨本身的一個有重大使命的會議，而是一個決定國家大計的繼往開來的最高會議。國民黨是全國的中心力量，擁有國家政治的領導權，關於統一、抗戰、以及救國、救民，都要國民黨健全，才有辦法。健全國民黨，不僅是國民黨自身的任務，也應是全國人民努力的總鵠的。作者本愛國民黨和愛國家之至意，願對國民黨臨全大會，貢獻數語，並作血路週刊社公開徵求對於國民黨臨全大會意見的回響。

我們國家是以三民主義建國的，國民黨是領導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的革命黨。國家政權是在國民黨手裏，國民黨的對外對內政策，就是國家的對外對內政策。誠然，國民黨有主義、政綱、政策；有幾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有歷來中央全會的決議案；並且有國民黨的政府和領袖所發表的法令、宣言、演講、談話；除此之外，尚有 總理的其他遺教，足以表明國民黨實行革命的精神，以及建國的方法、進程、和目標。但在此國內統一已成而需進一步的團結抗戰時候，我希望國民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切切實實發表一篇對內對外的基本國策，不求新穎，但要明朗化。

我國的外交政策，自然要自主、自動、和自強，但在此三條件之下，應該抱定以下各項原則：

一、對日抗戰到底，以求最後勝利。

- 二、擁護國際和平組織。
- 三、聯合在遠東有關係國家，制定區域安全公約。
- 四、努力與所有關係國家，個別交往。
- 五、確定只有一個敵人——日本。
- 六、時時以最有利於我們和最可能援助我們的國家，為中心對象。
- 七、對國際情勢的演化，要努力運用，時時警戒。
- 八、開展國民外交，以輔助政府外交。
- 九、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關於國家政治，在精神上應該加強民主化，在制度上應該集中化，澈底樹立廉潔吏治，改善地方行政的一切缺點。關於經濟方面，政府要從各方面努力發展國防經濟建設和國民經濟建設，並且要加以統制與調整。軍事要統一編制，統一指揮，統一信仰。教育要實行建國教育，（我們抗戰就是建國，將來建國的人才，應該在這個時候，培養出來），所謂「戰時教育」，不應該破壞教育的本質。財政方面應力求減免一切不必要的開支。

對內各項政策問題，在此不必詳說，僅希望臨全大會把過去黨和政府所發表的東西，參考現時所需，從新議定一個有計劃、有系統的國策，發表出來，並要聲明徹底實行，以慰國人之期望。

這次國民黨臨全大會的主要課題，我以為應該解決國內黨派問題，加強統一力量以對外。

中國要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國家，是天經地義。抗戰以後，國內各黨各派都表示願為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信仰三民主義的人雖然不必是國民黨，但在此一個主義之下，應該只有一個政治目的的組織——黨，這是常理。否則，是黨內有派，不是黨外有黨，黨內的派最好是不要！但因中國的黨派有特殊情形，我不主張國民黨強行合併其他不願解散加入國民黨的黨派；其他黨派也不可先向政府（等於國民黨）要求承認其獨立組織的法律地位而再與國民黨講合作。

解決黨派問題，應該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原則，國民黨不應當為解決黨派問題而有任何違反「國家民族利益」的地方；其他黨派自然也不該即因此故而向國民黨要有利於自己的解決。我以為臨全大會應該發表一篇解決黨派的辦法；至少注意以下各項原則：

- 一、三民主義既為全國的中心信仰——唯一主義，那麼國民黨要恪遵力行，非國民黨人亦不可在三民主義之外求主義，大家亦均不須曲解主義。
- 二、國民黨應該向全國人宣示：在三民主義原則之下，現階段應走的建國進程和採取的各項政策。國民黨自然要根據現實，按步的實現主義，其他黨派也不要三民主義再加上一個什麼「革命的」冠詞，或故意鳴高立異。
- 三、國民黨應該向全國人民宣示：信仰三民主義的人，都要互信共信，抗敵建國，只許有善意的批評和建議，誰也不許算舊賬！

四、國民黨和其他黨派應該把國家作到真正統一化，一切言論、行動，都不許妨礙統一與抗戰。國家除了有因時因地制宜的政治設施外，一切有政治作用的特殊和畸形組織，均不應存在。

五、凡是信仰三民主義的人，願意加入國民黨者，國民黨應該容納，但加入後，不准跨黨及有秘密活動，須一律服從黨章、黨紀、和黨的命令。

六、不願加入國民黨的黨派，黨的組織可以在事實上存在，但黨的活動，自應以法律為範圍。並應在國民黨、國民黨領袖、國民政府指揮領導之下，努力擁護統一與抗戰。

七、國家政權雖然是在國民黨手裏，但國民黨的特質是將來還政於民，所以政府用人應取人才主義，不分黨派；其他黨派也不必藉口向國民黨爭取政權，事實上各黨派人已經加入政府機構中工作。

八、自動解散原來組織而願意加入國民黨者，或其他黨派人士脫離原來黨派組織而加入國民黨者，國民黨可以依其各種情形，選其在黨內某部份工作，不論過去如何，均應一致團結努力。

九、國民黨雖然不能改組，但應整飾一下，即黨員要從新調查登記，屏除一切不革命份子。

十、國民黨應該與其他黨派及社會中有才能學識的人，從新組織為政府諮詢的代表民意機關。

十一、國民黨要向全國人民宣示：有實行憲政的決心與準備以及現在容納各黨派的誠意。

十二、國民黨應該徵求其他黨派的救國意見，以作參考。

十三、國民黨應聲明：真正抗日救國者，均予容納；否則，均屏棄之，並嚴禁其活動。

十四、國民黨應使其他黨派在抗戰救國之同一目標下，消除其互相間之糾紛，如不可能，亦當制止其互相攻訐而涉及國民黨之言論。

以上所說，乃是國民黨解決黨派問題辦法中的原則。臨全大會開會後，即應討論此問題，並分頭向其他黨派接洽，探詢其真實態度，但要詳察週顧，妥慎研究，再行發表。

× × × × × × × × × ×

中國是國民黨「以黨治國」為政治上最高原則的國家，在訓政時期中，黨是一切政府的源泉，全國最高政治權力的發動者。但在過去，國民黨把黨政混為一體，人治大於法治，實有礙於黨治精神和政治發展。今後應將黨政分開，黨在背後操縱政治。關於軍隊政治工作，應從新制定一個三民主義教育綱領，並要統一和澈底實行，使每個兵士都要作三民主義的戰鬥士，在軍隊中，黨政要支配軍政。黨章要加以修改，黨實行總裁制以求統一，各級黨部亦要實行專任制，組織要簡單，靈活，事權要統一，專責。黨內一切人事問題或政見的派別，大會應該確實調整一下，黨外雖可以有黨，黨內却不應有派，國民黨若是不統一，於任何一個國民黨員都沒有利！將來黨內有了名實相符的領袖，自然要注意外部的統一，任何人不得有違反主義與黨綱的行動。因此，國民黨須嚴整黨紀，並要普遍和澈底實行，打破一切情面，均以法律為準繩。對於黨員應該制定訓練辦法，使黨員與黨發生密切聯繫，明瞭和執行黨的意志。黨員的活動要透過各階層民眾，領導革命。黨的活動要以農村民眾為最大對象，喚醒、訓練、組織廣大民眾。對於黨員工作應有

考核辦法，以定獎罰遷陞的標準。在全國總動員中大會應制定一個黨員總動員辦法，振奮革命精神，「為民前鋒」。確定「民主集中」為黨制精神，黨員有表示意志的自由，但須絕對服從黨的意志和執行黨的決定。國民黨要大量吸收有革命性的青年，加以訓練。選擇青年黨員中有特殊才能、學識、熱血、忠實信仰主義者，施以特殊訓練，造成黨的幹部。負責務責任者，要有時代精神，「以身作則」，尤為重要；不能負起責任或無勇氣奮鬥者，最好休息一下，好讓他人來做。在黨外要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以作黨的新細胞，促進新陳代謝的作用。最後，希望與會諸公為國民黨前途作一番深切的反省；今後應當怎樣為黨為國忠實的努力了！開會期間，可以開誠儘量提供意見，大家商討；閉會後，只有服從大會的決議案，忠實執行，這種精神是太需要了！藉此機會，除了在會務上開誠交換意見外，在感情上也應開誠交接一番，捐棄一切感情的成見，加強黨的團結精神。閉會以後，大家都要抱最大的決心和盡可能的努力，領導同志，走上國民黨統一、健全、光明、偉大之路。作者用無上的誠意，謹向與會諸公，致最崇高的敬禮！

第一期目錄

健全黨的組織應從何處做起	吳開先
戰局鳥瞰	楊家驊
我想對國民黨說的話	王龍章
對於國民黨的期望	胡秋原
我對於國民黨的諍言	陳之邁
一個改造黨部健全黨員刷新黨務方案	曹聚仁
如何擴大黨的領導力量	陶百川
蔣委員長何以這樣的偉大	楊家驊
	鶴雲譯



黨員今後的中心工作

王龍章

我以為中國國民黨黨員今後的中心工作是「社會服務」。

一個政黨在尚未獲得政權時，它的主要策略是「鬥爭」；而在已經獲得政權時，它的唯一工作是「服務」。

我為什麼要如此主張呢？

第一。總理說：「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又說：「青年應立志做大事，不應立志做大官」。這幾句遺訓，就是國民黨以外的人，誰也不能反對。雞司晨，蜂釀蜜，難道人類不應該在本身職業以外再做一點造福社會的工作麼？況且黨員入黨，是為盡義務不是為了享權利，而本黨同志又均是有政治覺悟的人，與普通的「自了漢」不同。所以國民黨應該儘量發動黨員，服務社會。

第二。我們在過去並未做到「役於人」的地步。凡是黨內有什麼社會工作，儘管「七項運動」的規條訂得如何周密和善美，可是黨員只是站在台上叫，祇是居於領導地位，自己却不肯走到民衆的隊伍裏去。結果，黨來自羣衆，黨員自黨員，工作當然難有什麼成績。所以我們今後要做到「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第三。建國大綱上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三民主義的最後任務，是在民生問題的解決。我們以往有少數同志只是去做些黨的宣傳，組織和訓練等工作；關於民生疾苦，事實上尚未注意，這是一種缺憾。政黨是要民衆的，應當關懷於民衆最感痛苦的事，設法為其解除，或減少其痛苦，這種工

作是最有意義的。我曾聽到一位留學意大利的朋友說，法西斯的黨部，好像是一個慈善堂和俱樂部。像這樣服務民衆而又能接近民衆的精神，國民黨是應該效法的。

第四。假使不是為了這次的戰爭，也許國民大會早已開過，憲政早已開始，國民黨在法律上或者沒有指導民衆的特權了。那末我們要用什麼方法來接近民衆呢？我以為社會服務就是最好的方法，而且這種服務工作最能取得民衆的真心信仰。據說在美國費城的選舉地盤，直到前年為止，始終是共和黨的勢力，曾經有人問過當地負責人：為什麼費城選民一貫的贊助共和黨呢？他說：那要歸功於「個人的服務」。我以為黨員祇有從事社會服務，才能取得民衆的同情和擁護。

第五。現在國民黨的經費，大半取給於國庫。假如事過境遷，也許要有「黨員養黨」的一日，我們是不是以黨內無經費而停止一切活動？我們如果能未雨綢繆，早在民間開始社會服務，那時我們可利用社會事業來籌款，甚至於可以公開請求政府來津貼，誰也不能說這是一種不光明的舉動！

黨員可以做些什麼服務工作呢？

舉幾個例：關於「教育」的，如流通圖書館，閱書報室、問字處、民衆茶園、識字學校、職業補習學校等。關於一般「福利」的，如大眾食堂、公共禮堂、義務診療所，小典當，托兒所，勞工保險

，平民住宅等。關於「娛樂」的，如話劇、歌歌、音樂等。關於「人事諮詢」的，如升學指示、法律解答、健康指導、旅客導遊、代辦招考訓練等。若在戰事的前方，則應多做救濟難民，慰勞傷兵、收養殘弱、募集捐款等工作。

國民黨假使有一百萬人每人每日能抽出餘暇一小時來服務，則一天的總和將有一百餘萬小時的工作，日積月累，自會有偉大的成績，而收穫的，不僅是民衆，而且也是國民黨自己。

怎樣實現這個建議呢？

我以為：

(一) 中央黨部應添設「社會服務部」。否則，可就原有的組織部中設黨員服務科，宣傳部中設社會服務宣傳科。假如中央將來要設農工、商人、青年、婦女等部時，可就各部中，各添設一社會服務科。

(二) 省市縣黨部，亦應添設關於黨員社會服務的主管科處，以專責守。(聞上海特別市黨部，曾設立社會服務處，下設「人事諮詢」，「福利事業」，「社會教育」，「職業教育」，「民衆娛樂事業」等六個委員會。每一個委員會，指令許多黨員去參加。我據一位曾經服務該處人事諮詢的同志說，每日前往請求諮詢者，平均竟達二百餘人，可見民衆們的確有此種需要)。

(三) 黨應規定每一黨員至少要強迫其擔任一種或二種的社會服務工作。若是服務不力，要有懲處的法。

(四) 黨員如服務勤勞，成績優良，可由地方黨部呈請中央，予以獎勵。



蔣委員長之超人的精神和才能

鶴雲譯

本文是「蔣介石將軍」(原名 Chiang Kai-shek)傳記中的第三十七章。原書出版方一月，而在漢口銷售一空，足見民間對於此書的注意。本社本擬譯其全部，因聞某君業已先譯，祇得作罷。惟後三章對於世道人心裨益最大，當此動亂之時，實有儘先譯出國人必要，故特譯登於此。惟譯者學力有限，重以公私兩冗，字句中容有與原著出入之處，務乞原著者董顯光先生和蔣委員長特別原諒！(譯者)

蔣委員長是有宗教信仰的；就是在未受洗禮以前，他也始終過着基督教徒的生活。當豫東大戰時，一位跟他到前線的朋友，在一封信裏說：「從蔣委員長的日常生活看起來，誰也不能否認他在精神上早已是一個基督徒了。在他未赴前線之前，宋太夫人，一個虔誠的可敬的老太太，送他一本中文聖經，請他即使在最忙的時候也要讀牠。蔣委員長稱謝後，便把那本書接了過來，並且答應她天天都讀。在前線即使是在炮火之下，那本聖經無時無刻不擺在堆滿了公文的桌上。尤其令人稱贊的，是他不但把聖經擺在身邊，而且還每天不間斷的讀牠。這在他沒有受洗禮以前，他已經養成祈禱的習慣了。」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三日，在蔣委員長的岳母宋太夫人的家裏，由美以美教會江牧師(神學博士)主持，他受了洗禮。儀式很簡單。在祈禱後，江牧師問他是否誠懇的想做一個基督徒；蔣委員長以堅決的聲音答覆說：是的。然後江牧師把水灑在他的頭上，歡迎他入教。這是他和宋美齡女士結婚三年後的事。無疑的，他的入教是受了宋太夫人和蔣夫人的影響。蔣夫人自己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她自然要盡力之所能，助成蔣委員長在宗教信仰上的進步。

中國基督徒，對於蔣委員長的受洗，自然感覺到很大的興趣，並且很驕傲的指出：他的入教，完全是受了中國的影響；他們以為這是基督教最後終於成爲中國宗教的證明。那時候，外國人對於蔣委員長的入教，多少都感覺有點懸疑，因爲他們不免想到馮玉祥將軍的對於基督教信仰的動搖。甚至有人以爲他的受洗是政治上的一種活動；那簡直是無稽之談。這不過是蔣委員長個人的私事罷了，與國事是沒有多大關係的。事實上，他入教兩月後到達漢口時，某中文報曾在社論中詆毀基督徒，雖然沒有提到他的名字。

對於蔣委員長的入教，有一點是似乎爲所有的批評家所忽視的；那就是他的母親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所以他在宗教的氛圍裏長大的。研究比較宗教學的人，已一再指出佛教和基督教義(尤其是新約)的顯明的類似的地方。毫無問題的，他是受了蔣太夫人的影響，因爲她的精神教訓，使他很容易接近基督教的信仰。在這種信仰還沒有在他的生活裏成爲一種有力的要素以前，他已經受了佛教哲學的影響而養成刻苦生活的觀念。再加上家庭的影響和孫中山先生(也是一個基督徒)所樹立的模範，他的心田就成爲一個能夠接受基督耶穌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遺教的園地。

聖經所給予蔣委員長的精神上的影響，不能再比他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耶穌苦難節致南京美以美教會東亞會議那封信裏所表示那樣的清楚了。研究他的歷史的時候，這個文獻是很重要的，所以把他全文譯錄於左：

「沒有宗教的信仰，對於人生不能有真正的了解，革命的信念和宗教的信仰是沒有兩樣的。沒有信仰，大小事都是很難有所成就的。」

「碰到反對或將要遇着危險時，我們時常要退縮並且半途而廢。我們的缺乏信念，常是由於沒有強烈的宗教信仰。」

「我做基督教徒已有十年之久了，十年中無時無刻不閱讀聖經，我在西安被劫持着的兩星期中，他對我更爲有趣。西安事變突然發生後，我那時一無所有，從叛逆者那裏，我只要求他們給我一本聖經，因此在寂寞中我得到了充分的閱讀和沉思的機會。耶穌基督的偉大和慈愛，給我以新的神靈的啓示，增加我與惡勢力鬥爭的力量，使我不受引誘，維護正義。」

「我十分感激爲我所禱的基督教徒，並且我深刻的了解那個強有力的精神上的支柱。因爲這個支柱，我要感謝諸位教徒；對於這個支柱，我在諸位面前證明上帝的名字是可以得到光榮的。」

「基督耶穌的許多美德，我不能一一列舉，今天耶穌苦難節，我僅僅願意解釋我從耶穌的事蹟那裏所得到的教訓。他被釘到十字架上以後所說的話，是我們精神上的遺產。他請求上帝饒恕他的仇敵的罪，說：『願天父饒恕他們，因爲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基督的愛是真正偉大的。在我們所有的沉思之中，我發覺這些思想在腦海裏旋轉着，並予以精神上的食糧。」

「爲證明起見，讓我敘述些我在西安時的經驗

在我到西安之前，我已經曉得那裏駐軍的錯弄的思想和反常的活動；事先我已接到關於破壞國家統一的陰謀和叛亂的風聲的傳報。

「接近我的隨從，勸我放棄這次的巡行，可是我回答說：『目前國家業已統一，且其基礎亦已建立。總司令有指示和訓練的責任，這個責任是不能放棄的。而且，我已將身心獻於國家而為其服務，個人的安全問題已沒有任何考慮的餘地了。』」

「據新約的記載，當耶穌基督最後一次進耶路撒冷時，他很清楚的知道當前的危險，但是他仍是勝利似的騎在一頭驢子上進耶路撒冷，沒有痛苦，沒有恐懼。這是何等的偉大！何等的勇敢啊！比較起來，我的性命算什麼呢？那麼，我這應當猶豫嗎？」

「我的愛護士兵的程度之高，可說與弟兄間的愛一樣；這種愛，便使我走到叛亂的核心裏。這種爲了責任而不顧危險，使得政府不勝憂慮，使得同胞感到苦惱，並且使得基督教的友人們舉行了多次的禱告。在這些經驗中，我的了解和我的愛，都增加了。」

「我被劫持後，那些背叛黨國的人們向我提出條件和請求，說出客氣的誘惑的話，用暴力和折騰威脅我，並且用『人民陣線』來公開的裁判我。危險從各方面包圍着我，可是我根本沒有想到屈服於暴力之下。我對於基督的信仰增加了。在這個特異的苦難中，我清清楚楚的想起基督被過荒野的四十天，他的抵抗引誘，他在格羅西曼花園中的禱告，以及審判他時集中在他身上的侮辱，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在被釘在十字架上以後，爲他仇人在禱告的話。

「孫總理被困在倫敦時的禱告，我自然是記得的。這些故事，像圖畫似的在我的眼前一再的往返經過。我的用基督在十字架的精神去抵抗叛逆者的力量增加了。我預備在所謂『人民陣線』的裁判之前作最後的犧牲。決定採取這種行動之後，我的心

更安靜下去了。

「西安事變解決後，張揚諸人曉得他們的拙劣的叛逆的行爲，自然是很害怕的。我心裏記着基督要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一直到四百九十次，他們既已悔悟了，我覺得應當讓他們有自新之路。同時我很慚愧我自己的誠信沒有到能夠感化部下和制止他們犯罪的程度。

「自此以後，每逢訓練軍官或出征以前，我總以下列兩事向部下反覆申述：（一）如果查出我個人有絲毫的自私心或發現我的計劃違反國家或民衆的利益時，任何人都可依法控訴而處我以死刑；（二）如果我的言論或行動有虛偽的地方，缺乏誠信，或違背革命及其原則，我的部下的任何人可以把我當仇敵看待而置我於死地。我確實相信這兩句話是由衷心說出來的，是由宗教信仰中生出來的，是符合基督的博愛精神和孫總理的忍耐和寬大的。

「耶穌的歷史，是一個吃苦和受虐待的紀錄。他的忍耐精神，他的愛，他的慈善，照耀着他的整個的生活史。我的基督教的經驗中，我沒有得到過更有價值的教訓。

「孫總理是個基督徒，他從耶穌那裏所得到的最偉大的東西是愛，——對於弱小民族的解放和被壓迫民族的福利的愛。這種精神仍爲我們所保留，並且已達到很高的階段，我是革命的熱烈的信徒；雖然起初我對於孫總理的信仰沒有顯現出宗教的意義，可是那和宗教信仰差不多。因此，我成爲一個以三民主義爲基礎的革命的信徒。

「今天我已更進一步而成爲耶穌的信徒了。這使我深深的了解了：革命的成功，是靠有信仰的人。因爲有這種有人格的人，不會在困難的危險的環境之下，爲了個人的安全而放棄自己的主張，因爲他們是有信仰的。換一句話說，一個人的生命可以犧牲，身體可以失掉自由，但是他的信仰和精神永遠不能受到拘束，這是由於信仰所產生出來的信心。

「這些都是我在今天，耶穌苦難節的感想，因爲這是革命和宗教的信仰的重要性。

「上面所說的話，可以代表我對於耶穌苦難節的精神上的觀念，中間夾雜些我自己的經驗。我把這些經驗提出作爲證明，決不是要誇耀我的功績和成就，我是想藉這個機會向美以美教會東亞中央會議致敬，並感謝爲我而誠懇的不斷的祈禱的基督教朋友。」

蔣委員長是有魄力的 (energetic)。在中國任過一時的歐美批評家，常常批評中國政治領袖只會說空話，不會做實事。這話是有點對的，但是不能適用於某幾個將官，他們雖然也不免有過失，可是在某幾方面都是有魄力，有人格。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在他同時代的競爭者之中，沒有人能及得到蔣委員長。並且，的確的，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來在宦海中浮沉的所有的軍人，都沒有蔣委員長那樣的決斷快，行動速。他的這種性格，時常有人批評到，因爲這和他的主義、謙遜和樸素，是一樣的顯著的。白蘭德 (L. O. Brand) 於一九二八年在他的「蔣介石的事業」裏說他是個「推進和行動」的人。相同的，有人在紐約時報裏寫道：「蔣委員長的特異天才，是思想和行動的敏捷。在事業的進取上，比別人早一星期想出來，並且當他們正在開始想的時候，他已有行動的表現了；因此他便超越他的仇敵和競爭者。在中國，人們習慣於對於應做的事情，寫作長篇的論文；從事行動的人是重要的，而像他這樣的人也是罕見的」。他又說：「蔣介石將軍發現了中國的政治家和軍人直到現在很少學習到的東西，——那就是時間的重要；敏捷是行政上和軍事上的一個要素」。

新梯班諾夫 (Shpanoff)，一個在中國的俄籍軍事顧問，在他對莫斯科報告中說：蔣委員長的優點，是他的敏於決斷的能力，以及實行這種決斷的迅

速。斯氏引下列的事實，證明 蔣委員長的思想和行动敏捷：「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日，廣州市工人罷工，組織罷工委員會，並且到街上示威遊行。那時候，有許多俄籍顧問和政治指導員，他們的權力很大。國民黨裏又有共產黨員。但是他並不知道國民黨，就解除工人的武裝，阻止他們的遊行。於是俄國人便知道不是他們在利用蔣氏，而是蔣氏在利用他們作工具。」以斯氏又說：「蔣委員長如何稱到他的政敵對他的反攻，而於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個會議席上，宣佈共產主義不適宜於中國。」

蔣委員長不但自己相信作事要快，同時也堅持要別人學他的榜樣。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日，在南京國府舉行的紀念週上，他對於已經改組兩個月的國民政府之進步的遲緩，表示不滿。「在我未離開此地去巡行的三個月以前，他對在座的官吏和國民黨的領袖說：『我想在我的出巡期間，政府裏的幾個重要政務是可以辦理了的，但等我回來後，我發現這些事還在懸擱着。這好像指出我們在效率方面還是沒有進步。』」

一九三四年，蔣委員長對於長江流域諸省當局不能事先預防這個富庶區域的水災旱災的侵襲，極爲震怒。他發了一個類乎斥責負責當局的電報。當他在一九三四年擊敗共產黨的時候，他在特約新聞記者的談話裏說：「我堅決的信仰行動，而不相信空話。因此我有幾個月沒有接見新聞記者了。」據說他只顧埋頭做到某個確定的目標，而不願宣傳他所要做的事務的希望。

蔣委員長作事的堅忍和毅力，現在已被公認了。字林西報的一個社論說：「蔣委員長不以自己做事的堅毅爲滿足，他要別人也能這樣。」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廿六日，蔣委員長在南京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向中央軍校全體學生和由各省來京的許多軍事長官發表了有力的演說，要他們努力奮鬥，以復興國家而使其成爲世界上的強國。他以漢代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諸葛亮的名言勉勵聽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無疑的，蔣委員長已經完成一個有系統的行動哲學；他不但以此作爲自身行動的基礎，而且還想以這種哲學感化他人的生活行動。在這方面，他深深的符合中國善與人同的本性。「一個人應當以堅定的決斷，推進他的事業。如果他判斷錯誤了，還是一直做下去，因爲判斷錯誤而實地執行，總比較動搖的無所適從，要好一點。」即在西歐各國，也不是每個人都已發覺這種秘訣：對於事情的成功，做得快，比較做得百分之百的正確，更有關係。

蔣委員長不偏於唯心主義或唯物主義；他覺得人生的意義是工作，他主張一個人要使他自己的適合於工作。他似乎同德國哲學家盧道夫老子 (Rudolf Otto) 一樣的說：「人生即工作。」

蔣委員長的行動哲學，可以用他自己的左列的話表現出來：

「先總理常常說精神與物質是不可分割的。他很清楚的爲『精神』下一定義，以爲任何東西，只要不是物質，便是精神。『精神』的定義從來沒有像這樣的明確。所以我們應當承認在宇宙間，物質之外，還有精神。如果承認有精神的存在，那麼必有一心一和一意的存在，『心』和『意』可以解釋作爲知識或良知。重要的是知或良知應使其完全，也就是應使其實行起來。實行知識或良知，即是進行先總理的主張：『知難行易』。這樣，知識和良知不至變成空洞的東西，而做事的人也不至於變作無意義的觀念論者或機械的物質主義者。所以我們對於哲學的態度，既不當是唯物的，也不應當是唯心的。在宇宙間，不管是多少的年代和怎樣的環境，只有一個『行動』，這個行動是有創造性的。所以行易知難的思想，形成我們人生哲學的中心部分。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把行動哲學看作

行爲哲學」。

蔣委員長從來不好出風頭，不願駁斥不正確的言論，除非是它與事實相差太遠的時候。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中日之戰，就是一個最顯明的例子。他在「一二八」戰役中出力很大，他的朋友們再三請求他允許把真相公佈出來。他竭力的拒絕了。直到後來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將軍在赴美國的途中發表最毒辣的攻擊，說「一二八」上海抗戰，蔣沒有幫忙；直到那時候，蔣委員長才准許把事實的真相公佈出來。以前他拒絕發表事實真相的主要原因，是他不願說出任何的話或做出任何的事，以破壞外間新聞記者對十九路軍的極好的印象，雖然這是抹殺了第五軍在上海抗戰的英勇戰蹟。他了解中國民衆最後知道他們能夠在激烈的戰鬥中抵抗日本的攻擊，這對於中國人的士氣是怎樣的重要。對於他，這增援上海和他向十九路軍將領的建議，（這些建議，如果被採行的話，一定已使中國的軍力有更好的表現），他情願讓這些被人完全忽視掉，如果這樣可以有益於中國。對於 蔣委員長，效忠主義而生死以之，這是最重要的事情；他的真純的謙遜和毫無虛榮心的精神，使得他的自我刻苦成爲很容易做的事情。

蔣委員長有善於分析的頭腦。在一大一大的聲勢洶湧的集團給他以壓倒的威脅時，他都能戰勝次次要來的危機；他這種才能是時常爲人所稱道的。他不僅對於國內政治上的困難問題能夠立刻想出解決的辦法，而且在對外交涉上，他也顯示出同樣的能夠分析情勢而以有利於自己及國家之方法去解決的才能。現在讓我們舉兩個實例：一九二七年的南京事件和一九二八年的濟南五三慘案，他在每個事件爆發時的估量，以及用以解決各次事變的才能，大大的增加了他的聲譽。南京事件造成了他在華外國人中的地位；這些外國人有許多是因爲以前他是北伐的領袖而對他仇視的。濟南五三慘案，對於

整個的世界，顯示出他的外交家和政治家的能力。在上面的每次事變中，他的分析的才能，使他得到解決這種緊急事變的適當辦法。

因為蔣委員長有這種正確的分析事實的能力，所以他總能不惜黨內的分裂而與其他國民黨領袖們在漢口所主持的而以鮑羅庭為首的政府，宣告破裂。我們曉得，那些領袖們，後來終於承認與共產黨分裂的必要，並且在事實上步他的後塵。

由於他有分析的頭腦，他的分辯力，使他顯出一種使他朋友和敵人一再感覺驚異的「坦白」。這並不是說當某種情勢需要巧妙的措置的時候，他沒有「機警」；不過在他機警的後面隱伏着堅毅。譬如，有一次，北方某省主席對中央政府的態度有些曖昧，蔣委員長便派專使去見他，而在那位專使動身之前，他對他說：「問他是否願在將來的歷史上留下賣國的污點」。他又說：「你一定要把我每句話對他複述一遍，使他知道在任何環境之下，必須擁護國民政府。你要對他說：如果他被人逐出了該省，那麼我將派他做另一省的主席，以酬答他的忠勇」。這個軍閥並沒有高尚的人格，可是因為蔣委員長派人來向他說出這樣坦白的話，所以他就決定不買什麼大不韙了。

很少數的人是有這種天才的分析能力的特性的，所以一個人如果幸而具有這種特質，就足以使他成爲一個偉人。柏拉圖說：「能正確的分辯而判定的人，我將目之爲神明」。這似乎是少數得天獨厚的人所具有的內在的特性；如果他是與生俱來的，那麼他會在具有這個特性的人的生活行動和言語中把他自己顯露出來。

據說偉人也羨慕其他偉人與他自己共同具有的特性。這可以解釋爲什麼蔣委員長時常提到孔子在「大學」裏所發揮的道理。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他在南京演說，特別的引證了「大學」裏的兩段話，他以其最中最重要的地方是分析力。第一段道

樣說：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增加知識）。致知在格物，（格物即分析事物）」。

第二段和第一段的意義差不多：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大半靠着自身的力量在事業上有大成就的人，可以分爲兩種：偉大的全能者和偉大的專家。後者是包括對於某種技能有專長的最常見的一種人。他們不願性格和能力的發展而得到了專門的技能。他們很少能夠成爲第一流的偉大人物。只有全能者才能得到各方面的優越的能力而不是只有一技之長。蔣委員長就是這種偉大人物。

全世界的人們，或許以爲蔣委員長是一位良將；他對於中國內部的軍事方面有着極大的成就。可是他自已認爲把極廣袤的土地和極衆多的民衆置於國民政府勢力之下——這種軍事勝利，不算什麼一回事。他認爲新生活運動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才是他的真正的成就。蔣委員長的目的是，並不是征服土地和使國家在軍事上成爲強國，而是在心理上，體格上，道德上，精神和物質上徹底改造民衆。他的目的不僅是在某一個不足稱道的特殊方面得到高度的優異的成就。

現在，蔣委員長十分希望能以全部時間致力於國家的建設。他的料理軍務，那是由於環境的關係不得不然，而不是出於本心的情願。築路、疏濬、灌溉、治河、造橋、植樹、改良農業、根絕鴉片、掃除文盲、改善行政、剷除貪污、公私衛生之改良、大眾藝術修養之陶冶、教育、公私道德之改善、改良畜種，這些都是他領導着推進的事業的一部分

。他對於軍事效率和軍隊改進的注意，不過是各職務中的一項罷了。

蔣委員長的多方面的性格，使我們能夠拿其他的偉大人物和他相比較；——關於他的魄力，可以與拿破倫比較；關於他所維護的政治理論，可以與孫中山先生比較；關於他要全國民衆遵行的道德方面，可以與中國古代聖賢比較。可是，最後，他並不完全像任何他人，而祇是像他自己。第一流的偉人，決不會彼此完全相同的。他們多方面的性格和成就，是沒有兩個人可以相同的保證。有些時候，因為他對於別人的周到，人們會覺得蔣委員長是一個英國紳士。一九二五年北伐時，他和一個俄籍顧問，被迫到不得不在一個小山上露宿。勤務兵在他身上蓋着的小外套，第二天早晨忽然蓋在俄籍顧問的身上。這是那個顧問自己說的。當我們想到他的節儉，他的自我刻苦的習慣，以他的效忠於中山先生的時候，我們又會感覺到他有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可是，無疑的，以他對於「大學」的研究，以他在演講裏的愛好引經據典，以他宣揚道德的努力，蔣委員長是一位中國的大儒。又有些時候，以他的熱心推進根絕鴉片惡習的運動，蔣委員長又顯示出他有頂好的美國社會改造家的姿態。他的徹底，像德國人；他的正義感，像羅馬人；他的愛好自然，像希臘人。類此的譬喻，還可以無限的說下去。他的刻苦，令人想起不是印度人的爲刻苦而刻苦，而是天才者的刻苦。愛瑪孫（Emerson）說：「天才是刻苦者，是虔誠，是愛」。

蔣委員長的多方面性，（Many-sidedness）或許是他的最重要的個性之一；但是如果沒有其他的特性，則他也不過是一個「通天曉」（Jack-of-all-trades）而已。在他的基本的性格上，我們又發現了他的效忠、謙遜、簡單、毅力和分析的能力；因此他成爲近代中國的偉大領袖。

（本章完，全文未完）